



■ 加藤嘉一 著

- ◆ 日本80后青年才俊加藤嘉一留学北京大学5年，在全球重要媒体频频发表对世界主要国家时政的见解
- ◆ 2008年加藤嘉一首次以专著形式坦率表达一个日本青年“知华派”对新时期中日关系的认真思考
- ◆ 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以日为师，面对侵略，救亡图存；日本人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情如何？他们要向中国学习什么？中国人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领悟到什么？两个邻国到底如何相处？

以谁为师？

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東方出版社

以 谁 为 师 ？

——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傅跃龙
责任编辑:林 润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鼎盛怡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谁为师/(日本)加藤嘉一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60-3525-5

I. 以… II. 加… III. 中日关系-研究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7293 号

以 谁 为 师 ?

YI SHEI WEI SHI

一个日本 80 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加藤嘉一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82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60-3525-5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冯昭奎

—

正月十六，打开窗户，空气中还残留着烟花爆竹的烟味儿。一位年轻的客人来到我的书斋，他就是加藤嘉一。

他是为了请我为他近日即将出版的文集作序而来。

我最初知道加藤君的名字，是在2005年的大概是6月份吧。当时我在日本的一家大学讲课，因为5月份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发生了针对日本的游行，一些日本大学生听信媒体上有关中国人如何“反日”的宣传，问我“中国真是一个那么可怕的国家么？”这使我感到需要在课堂上消除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为此，我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一位不久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教授曾对我说，他在北京的时候，正值游行活动达到高潮，在日本国内的妻子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十分担心丈夫的安全，打长途电话说：“如果有人问你是从哪儿来的，千万别说自己是日本人，就说自己是韩国人吧。”那位教授在电话里哈哈大笑：“我白天还在游行队伍里看热闹呢。”第二个例子是我从网上下载的、时任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会会长的加藤君的一段话：“我在中国过日子非常舒服。中国人非常活跃，非常热情，跟日本相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来中国前，我曾以为这里的人很单一，但真的生活在这里，我才发现中国社会有着惊人的多样性。非常感谢中国让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化多样性，这让我感到沉醉其中，这种魅力是在日本无法体会到的。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正面和负面的现象，但总是在变化的，这种环境对我来讲是非常有魅力的地方。”“越去了解中国，越觉得有趣。中国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无论是语言、文化、饮食、思维方式，都是很多元的，在这点上跟日本很不一样。据我所知，日本是一个单一化的社会，不管是语

以
誰
為
師

言、饮食、规范等跟中国相比单一得多。我希望有更多的日本人能够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因为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单一化的国家，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由于此言出自一位日本年轻人之口，对未曾去过中国的日本大学生果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与久闻其名的加藤君第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中日文化与经济论坛”小型筹备会上。“中日文化与经济论坛”是原定在当年10月中旬于广州举行的“中日友好文化活动周”（后因故延期）的一项中心活动，聘请日本前总理海部俊树、中国前副总理李岚清、邹家华等多位著名人物为荣誉主任、名誉主任，看来是一项规格很高的活动。我作为“论坛”副主任参加了此次筹备会，到会的有多位在京的名誉主任、主任及其他国内文化和学术界名流。然而，在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的那次会议上，忽然走进一位20来岁的日本年轻人，令在场的与会者眼睛一亮。大概是因为当时屋里只有我一人会说日语，那位年轻人便自然而然地坐到了我的旁边，说了几句日语之后，他忽又转身与其他人说起了中国话。我惊讶地发现，他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让人觉得整个儿就是一个中国小伙子！

当有人问他“你有多大岁数？”他的回答也非常的“中国味儿”：“我是80后”。

在会议进行之中，此项活动赞助企业的技师将与与会者依次唤到会场的一个角落，为大家量身，以便制作正装，用于参加那次盛大活动。轮到那位唯一的“80后”量身时，我发现在场的老年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他那修长的身材，主持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汝信对他的身高发生了兴趣：“你有多高啊？”

“一米八五。”他答。

对他的身材，《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曾诙谐地写道：“高，瘦，与我们小时候看的日本片里的矮个子皇军完全两码事。”或许可以说，加藤君以自身的形象、尤其是以自身的言行，对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做出贡献”？

那次会后有午餐招待，在饭时我又与这位年轻人挨着坐，我感到与他很聊得来。

我与加藤君的第二次见面是一份面向日本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的总编辑王众一先生“撮合”的。在王先生的建议下，我俩在《人民中

国》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对谈。开始，我有些担心我这个“40后”与“80后”之间能不能跨越40多年的“代沟”相互沟通。然而，那次对谈的气氛很好，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特别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加藤君居然记得我说过一句“中国和日本都是‘改革中国家’”，并强调说“‘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的国策，日本在实质上也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课题。”后来在发表时，“中国和日本都是‘改革中国家’”成了整个对谈的标题。

加藤君来请我作序，就是我们的第三次见面了。由于我已经对他有了较深的印象，便欣然同意为他的第一本独自的文集作序，加藤君则将有关材料提供给我，这包括全书的目录以及准备收入文集的若干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然而，为了向读者负责，我没有满足于他所提供的材料，我饶有兴味地读了更多的他所写的文章，与此同时，我还到网上查找有关他个人的信息。

加藤君出生在日本伊豆的小农村，这个富士山下三面环海的小小半岛因为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而扬名于世。伊豆半岛属于静冈县，恰好，从1979年到1981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位于静冈县的静冈大学工学部留过两年学，当时学的是电子技术。比我初次去日本晚24年。加藤君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他说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自己处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开始北京生活。这使我想起自己最初来到滨松市的时候也是几乎处于“三无”状态，一句日语都不会，一个日本朋友都没有，兜里只攒着东京中国大使馆给的少量日元（每月45000日元的正式生活费是过后才按月汇到的）。

在百度网上，我找到“百度百科”收录的有关“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的词条，其中有：“生日：1984年4月28日；出生地：日本伊豆；爱好：跑步、感受、观察、思考、沟通……目前的目标：做个出色的媒体人；特异功能：通宵达旦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后面还有些内容，其中包括“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

我在想，都有过“从零开始”到对方国家留学、生活的经历，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最重要因素），促使我们都乐于把中日关系

以
谁
为
师

以
誰
為
師

（日中关系）作为自己观察、思考、与他人沟通的热门话题；促使我们都乐于成为以推动中日关系（日中关系）的发展作为己任的有志者；也促使整整相差两代的中国老者与日本青年找到了很多共同语言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

二

关于中日关系，我感到加藤君既怀着要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热情、愿望和使命感，又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抱有相当实际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写道：“21 世纪上半期，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两国关系。它充满着结构性矛盾。两国之间曾有过不幸的历史，它每时每刻都纠缠着我们。两国正在面临着领土争端、能源博弈、地缘政治、美国因素等现实中的战略困境。两国正在也不得不慎重对待食品安全等‘突发事件’，它不仅难以处理，还容易煽动民族感情。”在充分估计到中日关系发展所面临的困难的同时，加藤君还认为“不过，中日将共同繁荣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经贸、金融、环保、能源、人才、研发、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假如两国能够积极而耐心地扩大合作领域，踏实而多面地展开交流，将是多大规模的合作体？如此大规模的合作体将如何推动东亚的繁荣？扮演负责任‘利益攸关者’的中日两国又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些都是充满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更是充满潜在性的现实使命。”

我作为日本问题的研究者，作为中日关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对加藤君有关中日关系的看法有着很多“共鸣”之处。“复杂”、“困难”、“敏感”、“棘手”等等，是人们形容中日关系的常用词汇。与此同时，我感到对中日关系问题，需要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大环境中来加以考察。在此，我想利用写序的机会，以跟加藤君“互动”的方式，谈谈自己对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的看法。

第一，记得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与加藤君对谈时，我曾经说到：“中日间‘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最重要之点是双方确认中日‘互不构成威胁’，如果双方继续互相视对方为威胁，就会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深刻的真正的威胁”，换句话说，中日两国不仅不应互视对方为威胁并为此而“磨刀霍霍”，反而应该互相精诚合作，共同应对绝非是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绝非是“将来时”的、而是“现在进行时”的人类共同威

胁，这就是我们两国乃至整个世界正在面临的气候变暖等环境危机，我们应使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服从于应对人类文明与大自然施加于人类的无情惩罚之间的矛盾，这也意味着使局部服从于全局，使“国益”服从于“球益”（人类共同利益），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拯救人类共同的家园，那才是中日两国关系应有的、或者说理想的状态。

然而，不能不承认，现实政治中的中日关系离开这种“应有的、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之所以存在这种距离，不只是中日两国的问题，也是因为在当今十分复杂的国际关系大环境中，中日关系不大可能“单枪匹马”地朝上述应有的、理想的状态快速迈进。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处理领土主权争端之际，哪一个国家能够按照“局部服从于全局，国益服从于球益”原则行事呢？哪一个政治领导人敢说，比起“拯救人类共同的家园”这个大局来，我们与他国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让次要矛盾服从于应对全人类课题这个全局吧”这样的话来呢？即使我们假定，有的国家领导人具有这种顾人类文明发展大局的高尚的精神境界，采取“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的大局为重，努力避免人类陷入‘内耗’”的高度理性的政策，那么，在他身后的本国的激进的民众会答应么？对于大多数领导人和政治家来说，能否坚持“国益至上”甚至是民族主义的立场，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而一旦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主导本国政策的作用也将随之消失，他的高尚的精神境界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尽管从道理上说，“球益”高于“国益”，“国益”寓于“球益”之中，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却依然处于“国益至上”的困局而难以自拔。记得几年前我看了那部著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我当时的感想就是，当今人类就如同一艘正在下沉的巨大航船上的乘客，不是齐心协力促使航船驶向光明彼岸，而是热衷于争抢救生艇。你觉得这可悲吗？但恐怕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个现状。

第二，诚如加藤君所说，“21 世纪上半期，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两国关系。”确实，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之深，具体问题的清单之长，是其他主要国家之间所罕见的。正如加藤君所列举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能源博弈、地缘政治、美国因素、突发事件”等等，而且每一个问题的爆发，每一个矛盾的激化，都可能演化为震撼整个中日关系的巨大冲击。而在我看来，对于当今的中日关系而言，别说是

以
誰
為
師

“球益”高于“国益”，就连“国益至上”、即“两国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出发点”这样的低层次低水平也未必能达到，这是因为中日之间至今未能真正实现法德之间那样的“历史和解”，加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双方所引起的不同的心理反应等原因，在两国关系中依然存在着太多的非理性的情绪化因素，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可以置国益于不顾的、不惜摔盘子摔碗的持续的争吵、斗气和愤怒。所以，在 2006 年秋天两国领导人终于达成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共识并推进“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互访，应该说是一大进步，然而，“战略互惠”与“战略互信”如同推进两国关系的两个轮子，前者的确认和后者的缺失，使得当今的中日关系的发展依然不够平稳。

加藤君认为：“中日政府和人民从‘友好主导’走向了‘利益主导’，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我们的进步。”我理解加藤君所说的“进步”就是指两国开始能够比较理性地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处理两国关系。但是，我们既应该肯定中日关系能够走到“利益主导”是一个“进步”，却不能高估这个“进步”，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什么是“国家利益”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布什和奥巴马对于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理解有着很大不同一样。与此同时，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各个局部的利益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一国的主流政治往往会被某些局部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正如布什的政策曾经被美国的“军产复合体”（艾森豪威尔语）和石油大资本集团牵着鼻子走一样，在这种场合，“国家利益”被偷梁换柱，矮小化为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真正的国家整体利益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还表现在：有的人对“国家利益”看得比较狭隘、孤立、“至上化”、绝对化，而有的人则比较注意“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地区利益乃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利益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有的人倾向于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看作为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或“冷若冰霜”的利害关系，主张将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与国民间的情感关系区分开来，而有的人则比较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与国民间的情感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信“物质”与“精神”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我就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转化论者”，坚信为了使中日关系真正得到改善，最大课题就是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没有两国在国民

层次上增进相互理解，就没有两国关系的真正改善。日本著名导演宫崎骏所主张的“要把孩子们从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号召，应该成为我们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重要目标。

第三，当前，比环境问题更能够唤起政治家关注和着急的是世界金融危机问题，这场被称之为“金融海啸”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让世界各国的当政者颇感为难和“背运”，特别是对于把“支持率”或“选票”看作政治命根子的日本政治家来说，为了应对战后最大、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以及伴之而来的国内各种矛盾的加剧，一个积极的办法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大力加强国际协调，特别是加强与中国、美国的合作，以便缓解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对于政治家来说，也会存在着另一种政策选项，这就是为了转移广大国民对国内矛盾的注意而故意利用、不惜激化与某个或某些外国的矛盾，以便使当政者得以在政治上“减压释负”。比如现任首相麻生先生当不当正不正，恰好在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时候，再度祭起“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法宝，明显地反映出他“急中生智”，采取上述的后一个政策选项的动机。但是，人们可以相信，在全球经济处于危难时刻，如果出于政治私利而玩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陈旧手法，太有悖于日本的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不仅不会得逞，反而落得“玩火自焚”的下场。可以相信，包括麻生首相在内，不至于坚持推行这种激化国外矛盾以转移国内矛盾的背时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还依然存在，不容模糊；另一方面，各国的利益互相渗透、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有所求，换句话说，各国的利益不再是互相孤立、互相隔绝、互相封闭、互不相干。经济全球化加上前面所说的世界环境危机，导致人类已经进入了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地封闭地看待“国家利益”的时代。面对金融危机大敌当前，中日两国现在不是争论中日两国经济谁有求于谁的时候，也不是争论谁对方之所求更多更大的时候，我们两国应该坚定信心，携手合作，共克时艰，抱团取暖，渡过难关。如果两个国家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不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反而为局部的利害关系争个没完，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吗？这符合我们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的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吗？这符合我们两国改善国家形象和提高国际地位的期待吗？世界各国都各有各的难处。如果只管自己活好，不管他人死活，到头来自己也活不好。与人际关系一样，100%只考虑自己利益

以
谁
为
师

的人是很难与他人搞好关系的，这个道理也适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日两国离得太近，锅碗瓢盆，磕磕碰碰的事儿在所难免。当两国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协商解决，不要激化矛盾，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要防止斗个没完，两败俱伤；要防止再次出现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总之，我们决不要让“战略互惠”成为一句空话。

总之，虽然中日两国关系应有的、理想的状态与现实政治中的中日关系状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是，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悲观和绝望，因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真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我想，这也是我和加藤君之间存在的最大的共识和信念。如果说“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拯救人类共同的家园，是中日两国关系应有的、理想的状态”，那么，如何缩小中日关系应有的、理想的状态与现实的“中日政治”（中日政治关系 + 中日两国国内政治）之间的距离，正是那些基于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坚定信念、为推进两国关系发展而“发挥余热”或“奉献青春”的有志者们的努力方向。我以为，这里所说的“缩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的具体体现是：两国在多大程度上以实际行动印证“第四个政治发文件”所称的中日“互不构成威胁”的表态？两国的国民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环境危机是两国面临的真正的、最大的现实威胁和最大的安全关切？两国的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将应对两国乃至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意志？两国的媒体和学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不昧良心、求真务实，为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应有的、理想的状态而努力？

尽管环境问题已经在折磨两国人民，更将会威胁子孙后代的生存，但那毕竟是一个超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涯长度的长期性课题，因此，时代呼唤着充满对于当代人民及其子孙后代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真正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真正能够留名青史的伟大政治家。那种怀着“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的极端自私心理的政治家终将为人类所不齿，为历史所唾弃。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近年来所出现的、两国政府间关系与两国国民间关系出现的“逆差距”。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一个持久性特征就是两国国民间关系领先于两国政府间关系，前者推动后者；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两国国民间关系滞后于两国政府间关系，前

者拖累后者的不正常现象，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日本媒体。加藤君将日本媒体的对华宣传报道解释为“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出现各种议论并不奇怪”，但是，为什么红、黄、橙、绿、青、蓝、紫七种色光能够构成自然的光，而在“言论自由”的日本，各色对华舆论却构不成对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自然而正常的反映呢？正如加藤君所说，“不知道是很危险的”，“片面认识对方国家也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媒体很注意帮助读者全面地认识日本，希望日本的媒体也能够这样做，因为我同意加藤君的说法：中国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作为日本的媒体“当然还需要介绍中国正面情况，这才能够端正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好的地方，或者只有坏的地方，两国媒体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是介绍两国多元的面孔，这才是健康的”；“一个人喜欢日本，还是一个人喜欢中国，这本身是一件个人的事、个人的问题。但在一个国家里，非常多人不喜欢中国和日本，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一目了然，与中国人对日感情好转相比，日本人对华感情不仅没有好转，还有所恶化。”而在“非常多人不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或许可能出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民间的情绪化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而不受阻拦，如果果真出现这样的政治家及其政策，那不仅将损害日本的利益，而且对于日本将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三

我愿为加藤君的第一本个人著作写序，是因为我感到他的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第一，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反映了一位智慧过人的年轻人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而且体现了他与关心中日关系的众多中外青年进行深入而频繁的交流的成果。

从2003年来到中国至今，加藤君参加了100多次学习交流活动，其中有50多次他是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与的，另外50多次他是作为评论员、嘉宾参与的。除此之外，加藤君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瞭望东方周刊》、《看天下》、《人民中国》（日文）、凤凰网等担任专栏作家，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论，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反应、反馈与反响。加藤君就是这样通过与不计其数的网友、读者的“互动”

以
誰
為
師

中进行写作，不断扩大他作为观察者的交流范围与作为写作者的辐射范围；与此同时，又通过“观察思考、交流碰撞、再观察思考”的周而复始的螺旋式循环，不断提高自己的观察与思考的能力和水平。

一位自称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常客”的网友称，加藤君是“（我）想（与之）交流的一个人”，称他“是一个考上东京大学，又放弃，来中国的留学生；一个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人；一个每天跑10公里的人；一个只有24岁、却如42岁般深刻的人；他的文章视角总是独特的。”

加藤君能流畅地使用日文、中文、英文3种语言做同声传译，他的杰出的语言能力成为自己与中外青年“无障碍交流”的有利条件。中日关系的未来属于青年；中日关系的未来要靠两国的青年来创造。加藤君的这本著作所反映的青年人的声音应该说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很有水平、难能可贵的。

第二，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他不仅反映了年轻人的声音，而且也值得关心日本、关心中国、关心中日关系的中老年读者阅读和参考。

如前所述，网友称其为“一个只有24岁、却如42岁般深刻的人”。只要你读读他的作品，你就会觉得这句话并非言过其实。

在我这个老人看来，“40多岁”正是阅历已丰、朝气未减的“思想青春年华”，虽然从人生经验的角度，人越老经验越多，但是老年人也容易为过多的经验所累、所束缚，甚至陷入“经验主义”。

其实，人的生理年龄与思想年龄未必一致。有的人很年轻，其思想的成熟度却超越了年龄。加藤君正是属于这一类人。

加藤君正像香港凤凰网博报将他评为2008年度“十大观察家”之一的“获选理由”中所描述的：“在他的博客中却总是体现出超出年龄的睿智和成熟。”

“十大观察家”均有“精选博文”，加藤君的“精选博文”是“温家宝总理的魅力在哪里”，他写道：“我一直以密切来关注并跟踪温家宝的政治风格。坦率说，温总理不太像政治家。在我眼里，政治家一般很严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以往的政治家不同，温总理格外善于跟老百姓进行心连心的沟通，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和’，温总理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政治家当中最温和的一个。许多日本人也欣赏温总理。”

“据说，胡锦涛与温家宝，即‘胡温体制’的特征是‘亲民政策’。我2003年来到北京后也常常看到两个领导人搞‘亲民’的场景。在此过程中，温总理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其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确实以自己的性格与信念演绎着‘胡温体制’的亮点。……在本文中，我想用8个形容词描述一下此次温家宝总指挥表现出的政治风格。”这8个形容词是“亲切”、“认真”、“勇敢”、“坚韧”、“慎重”、“纯粹”、“耐心”、“温和”。

对以上8个形容词，加藤君都有一段解释，其中，对“纯粹”一词的解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相信，没有人敢否定温总理的纯粹。这指的是他的性格。我这次通过电视屏幕每一次看到温总理就直接感到，他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地纯粹？好像刚生下来的孩子或没有任何混杂成分的清水河一样，很干净。我们在世界上很难看到像温总理那么地纯粹、可爱的国家领导。思想将日益成熟，性格则永远纯粹。这也许是真正的‘大人’”。

我完全无意介入政治和评价政治人物之类的活动，我之所以大段引述加藤君的“精选博文”，仅仅是因为我被这个“日本大男孩”的观察之深入和描写之细微所打动。

第三，这本书的又一个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以做“媒体人”为历练机会、以做“政治家”为人生目标的日本青年的成长路上的一个丰碑。

加藤君毫不掩饰地对人们说，他的志向就是要做一名政治家。

在日本，我不止一次地目击从媒体人到政治家的华丽转身的事例，也许，加藤君在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之际从这些事例获得了启示？这只是我的猜想。

加藤君很活跃，很合群，很会沟通，据说也“很擅长谈判”。有记者称：“加藤嘉一是谈判者。他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发挥语言、协调、沟通之优势，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愿望最大化。至今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中国有句名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的采访报道，加藤君出身贫寒之家，自3岁开始种地、13岁开始打工，由于父亲的公司破产，欠下了许多债务，他在十几岁时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不知道接了多少次令人难

以
誰
為
師

以 谁 为 师

堪的电话，甚至“在身上留下了一些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伤疤”。也许，如今的加藤君的“谈判能力”与“十几岁时跟讨债人的沟通”这种严酷的磨练有所关系吧。

如今，在日本的政坛上活跃的政治家大多是“子承父业”，有浓重的世袭政治的血脉色彩。然而，日本 NHK 电视台的一项舆论调查表明，在 20 世纪的日本首相当中，最受日本国民尊重的政治家恰恰是平民出身的田中角荣。因此，出身贫寒之家，对于加藤君做政治家的志向来说，既可能是不利条件，也可能是有利条件。关键在于加藤君自己如何努力，当然也要看日本的政治体制的今后变化对出身于平民的优秀人才能否给予更多的宽容。

作为一个老者，我真挚地期待加藤君能够在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路上走好！

写于 2009 年 2 月 20 日

自序

2008 年是我的本命年。回顾起自己成长的 24 年，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中日关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无论自己怎么感受还是大家怎么评价，在这几年以来，我反复落实观察—思考—表达中日关系的过程，它似乎成为不可摆脱的轮回，或不可推卸的任务。

“你能把中日关系观察到位吗？你有什么资格谈论中日关系？你提出的观点有没有正确根据？立论是否客观？你真的以为你所表达的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你能对中日关系担负起什么责任？……”这是朋友们的疑问，也是我自己的反思。

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够不够细致。我不觉得自己有权威资格谈论中日关系；我不敢确认我说的包含着足够的根据，或者立论一定客观。我的道理和说服力还有待提高。我绝对不能轻易说负什么责任，怕做不到……

是的，我一直是半信半疑的。对于自己所观察到的问题、所思考的视角、所表述的观点，我从来不带有任何的自信和乐观，相反只是紧张和不安。这是我的状态。不过，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想或者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已经在想、已经在做，更在于你还会想、还会做。既然如此，我只好选择顺其自然，不要多问为什么，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既然如此，我想全力以赴做好自己。

观察中日关系，我还是感到有趣。其趣味有很多方面：

首先在于它的复杂性。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过去、今天、未来，国家、民族、公民，合作、竞争，歧视、重视，喜欢、厌恶，时尚、传统……众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牵涉。因此，事情本身因为错综复杂，是不可能一朝一夕、简单明了地解开的。我认为，中日公民都需要加深对中日关系“复杂”的认识。

以
誰
為
師

以谁为师

其次在于它的深远。对于每一个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现象，其根源、性质、影响，我一直怀疑它到底有多深、多远。其根源也许基于2000年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开始交往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命运；其性质也许来自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近现代以来解决各自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自我认同；其影响也许与100年以后的中日交往状态有联系。我认为，中日公民都需要提升对中日关系深远性的认识。

最后在于它的现实性。每一次，中日两国的媒体刊登报道的时候，政治家发表讲话的时候，学者提出观点的时候，网民表示愤怒的时候，我都不不得不想到一点：“我明白你这样说，但问题究竟在哪里？到底什么是问题？”对的，我们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问题，不应该每一次遇到一条新闻、一次讲话、一个观点、一场愤怒后，马上觉得“有问题”。我认为，中日公民都需要提升对中日关系面临问题的认识。

我真正开始观察、讨论中日关系，其动机应该是2005年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那时我在北京的现场观察了游行队伍，事后接受了采访，第一次认真思考了中日关系。随后，我不知不觉参与到中日之间的各种政策讨论、学术探究、媒体竞赛、学生辩论等活动之中，至今已过了3年多。这3年多，归根结底是我自身对中日关系所折射的复杂、深远和问题提升认识端正态度的过程。这么概括，应该没错。

《以谁为师？》是我24年里首次发表的用中文书写的专著，由“体验篇”、“感受篇”、“观察篇”、“思考篇”以及“探索篇”组成，一共包含着125篇文章。有的是曾经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过的，有的是我重新写的。虽然125篇文章的长短不一，形式不一，但我始终有意贯彻的是思想和情感的统一。即这些文章所表达的观点与我对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核心立场有着紧密的关联，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如何相互学习？”

经过3年多的观察与思考，此时此刻，我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是需要相互学习的。中日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既有矛盾，又有共识，既有仇恨，又有喜悦。什么都有，却什么都不是。中日交流真令人疲惫，中日关系真令人烦恼。但大家却相当相当地相互关心，相互重视。政治家、官僚、媒体、商人、文艺人、学者、青少年，